

热历史

古代考试如何防止冒名顶替？

史海钩沉

古人也有应试辅导书

□王东志

在古代，从隋唐开始，科举考试就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，这一制度虽然有不少弊端，但给不少士子提供了进入朝堂的机会。因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性，封建统治者对参加考试的考生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，但考生的作弊手段仍然层出不穷。

据清代朱克敬《瞑庵杂识》的记载，嘉庆三年，湖南乡试，傅进贤买通负责考场的小吏，将一份优异卷头的姓名籍贯栏割下，贴到自己的卷头上，再把自己的卷头贴到对方卷头上。发榜时，傅进贤高中第一名：解元。被割了卷子的叫彭莪，自然是名落孙山。

考完后没多久，彭莪的老师罗典，应邀去讲评本届乡试的考卷，他看到解元的卷子后，登时目瞪口呆，内容与彭莪的一模一样（彭莪曾把自己的考卷重新默写了一份给老师看），甚至字迹都是彭莪的。罗典当即向湖南巡抚告发，傅进贤自知理亏，托人找到彭莪，说愿意帮他捐个道员，并给他白银万两及良田美宅等，但罗典不答应。最终，傅进贤和负责考场的小吏被砍头。

古代科举考试不像现在有监控和身份识别等技术。那么，古人在防“冒名顶替”这方面有哪些措施呢？

童生试是清代地方录取生员的考试，三年两考，通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个阶段方可称为生员，亦称秀才，古代学校称庠，生员又称庠生。员额通常是大县20人、中县16人、小县7人至8人。

清代童生试中，为了防止出现“冒名顶替”的事件，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都需要有人担保，考生到县衙礼房报名参加考试时，除了填写本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外，还要填写上至曾祖父三代在世情况和做官与否的履历，同时，还要递交统考五人互保的证明材料，以及本乡廪生认保的证明等材料，保证不是冒籍、匿丧（按照清制，父母去世27个月内为首孝之期，不得参加科举考试，违者称为“匿丧”，人们习惯称丁忧）、顶替、捏造姓名等情况，并保证身世清白、非娼优皂隶后代，才能参加考试。

清政府规定，凡报名应考的童生必须是本县（州）人，外籍士子需由地方政府认定已入籍者，可视同本籍。尽管采取了考生互保、廪生担保等措施来防止“顶替”事件发生，然而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清代还是有不少冒籍的现象。

清末，被誉为“状元实业家”的张謇，16岁时由老师安排，冒籍以如皋县张家儿子的身份参加应试，后来如



▲清末科举考试的“浮票”，类似现在的“准考证”。考生在进入考场时，要持“浮票”入考场。（资料图）

皋张家变卦，不断向张謇索要酬金，张謇一时拿不出来这么多酬金，被告上公堂，直到张謇20岁时，经过多方斡旋，张謇才恢复原籍。

考生在进入考场时，要持“浮票”入考场。“浮票”类似现在的“准考证”，在宋代时就有了。由于当时没有照片、身份证明和指纹识别等技术手段，因此浮票上详细记录了考生的身高、体貌，注明有无胡须、胎痣等明显特征，上面钤盖大小不同的关防印，伪造难度很大，确保证件的真实性。入场前必须经监考官将浮票载录信息与本人仔细对比，核对无误方可进入考场。

到了清朝中后期，还出现了面貌册，考生在履历表上要填写相貌，因为当时没有照相技术，古人有留胡子的习惯，所以，胡须状况就要认真填写。清人钱泳一生不事科举，他在《履园丛话》中记载：当时有个考生叫沈延辉，三十多岁，在相貌栏填“微须”，大概想表述胡须不多罢了。考官胡希吕为人固执，认为微须就是无胡须。因此，其他几位同样填写“微须”的都被看成假冒，不准进考场。沈延辉和秀才们觉得委屈不公，于是与考官胡希吕争论起来，胡考官生气地说：“朱熹老夫子在《四书》中明明白白注释‘微者无也’。你们读书人连这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秀才们反问道：“经上说，孔子微服而过宋，难道孔老夫子脱得赤裸裸的吗？”

胡希吕一听就傻眼了，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就不再为难他们了，这一故事也广泛传开了。

为了解决“顶替”事件的发生，康熙年间在童生试中增加了审音制度，对考生进行核对口音，以判断是否本地人，审音制度重点在顺天府推行，其他省份也适时推出审音之举。

顺天府的大兴、宛平两县为四方士子会聚之地，历来入籍者甚多。乾隆时专门为打击无故“顶替”本地人现象，还专门设置了审音御史一职，同时，朝廷作了严格规定，对考官审音不严的给予降级或就地免职处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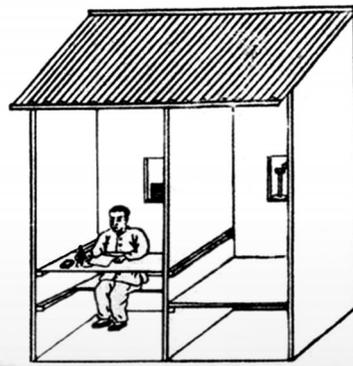
在考官管理方面，朝廷设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。乡、会试考官被任命后，连家都不能回，路远的立刻出发，不带着眷、不举行欢送仪式，更不许带多余的随行人员。路途近的考官，要尽量避开有考生的地方，进入贡院前不准与外人接触，入院后实行锁院制度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更有甚者，考官所住场所用封条密封。最不幸的是考官的子孙和家族人员，为了回避，清朝早期曾为他们专门另设考场，后来干脆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了，以至于不少家庭，父亲常年担任考官，儿子却常年不能参加科举。

据清代《钦定科场条例》中记载，复试制度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在乡、会试发榜后再进行的考试，以对拟录取人员的资格重新认定。此外，为了保证阅卷的公平准确，清政府又实行了磨勘制度，所谓磨勘，亦称磨对，就是在乡、会试阅卷后进行复核。先察看考官在出题和阅卷中是否有纰漏和错误，再看考生的考卷。如果发现考生卷内有文理悖谬、文体不全、全篇录旧等严重问题，则革去举人的身份；对有俚言谐语，不避庙讳、御名、圣讳，以及多韵少韵等问题，则可保留举人名，但不许参加下届会试，称为罚科。磨勘罚科一般罚停一至三科不等，重则连考官也受处罚，分别给予降级或罚俸处分。

为保证责任分明，磨勘官要填写姓名并注明问题所在，使考生（官）对错误问题心服口服。乾隆二十四年顺天乡试第四名边向禧的考卷中有“饮君心于江海”一句，乾隆谓其荒鄙杂凑，不成文义，特旨罚停五科。

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复试和磨勘制度也不失为防止科举考试中出现“顶替”的有效方法和手段。

（《北京日报》）



▲考棚

□雨林霖

广义上的科举教材主要是指各类经史图书，但到了明代，尤其是明代中后期，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，而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，于是，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，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。所谓“时文”，即科举时代应试的文章。当时出版业发达，从明代开始，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，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了出来。

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、弘治年间，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出现了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《京华日抄》，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，相当于“高考优秀作文选集”。此书一面世，深受士子们欢迎，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进涌出来。到了明朝后期，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供销两旺的态势。

当时，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在福建建阳，建阳书坊所刊刻出版的图书当中，很大一部分是教材。有学者曾经统计过明代建阳各个书坊所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，得出一组数据：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是757种，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.11%。这说明，科举教材是当时最为畅销的书籍种类之一。

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，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，教材本身有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比如，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《四书翼经图解》，将传统的“四书”加以释文和图解，使其更为通俗易懂，面世之后颇为畅销。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，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，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极大的提升。当然了，还有一部分奸商，假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，这种做法有悖道德，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，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生活史

古代养蜂业

□杨世明 梅绚

东汉末期，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养蜂专家出现于史料中，其名姜岐，是今甘肃天水人，博学多才，但不愿为官，隐居山中，以养蜂为乐。姜岐从冬季保护、蜂蜜采集等方面对蜜蜂的饲养方法做了改进，蜂群发展很快。乡邻看到之后，纷纷到姜岐家学习饲养方法，以致陇西郡学技者络绎不绝。姜岐的养蜂生涯揭开了我国人工驯养野蜂的历史篇章。

隋唐时期，养蜂业已颇为成熟，许多诗人都描述了民间养蜂之事，如杜甫的《陪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》中称“柱穿蜂溜蜜”，描述了蜀地民间将蜂箱置于屋檐下，防止风吹雨淋的情景。罗隐专门作了一首《蜂》诗：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这时还出现了原始的养蜂防护服，史料中称其为“草衣”。

宋代养蜂业更上一层楼，发展出了许多新的养蜂技术。北宋王禹偁所著《小畜集》中有一篇专论养蜂，提到蜂群会因为出现新的蜂王而分群。还写到每次收取蜂蜜，不能竭泽而渔，否则蜂群就会因为饥饿而消亡。南宋学者罗愿《尔雅翼》中记载：“今土木之蜂，亦各有蜜。北方地燥，多在土中，故多土蜜；南方地湿，多在木中，故多木蜜。”描述了南方和北方蜂蜜的不同，这表明此时蜂蜜不仅已有明确的类型分化，还出现了地域上的分化。

元代出现了多种蜂箱，材质有砖、土、竹、木等，蜂箱的摆放、设置也有明确的技术要求。在蜂群管理上，不再局限于人工限制蜂群分群，而是根据蜂群状况适时分群，以提高蜂蜜产量。元代还建立了大型“国营”养蜂场，专为宫廷供蜜。

明清时期在养蜂技术上并无大的突破，多是对前代经验的总结，但养蜂业的规模也不小。乾隆时期，宫廷中便常设采蜜队伍，专门收取蜂蜜。民间养蜂更是极为兴盛，被视为一本万利的生意。

（《定西日报》）



▲清代顺天府贡院（资料图）